

论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制约因素与对策

刘志铭

当前,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景气的情况下,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已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声音。事实上,我国在1998年上半年以来就已经逐步地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迄今为止,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对投资需求的扩大起到了较大效果,但消费需求增长却依然缓慢,而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目前已达60%左右,从社会再生产来看,也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持续的拉动力量。因此,研究当前制约消费需求的因素,并提出提高消费需求的对策便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制约我国当前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1. 消费体制因素。改革以来,我国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费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取消了粮、油、布等的定量票证供应制度和价格管制,解放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消除“吃、穿、用”消费资料短缺提供了制度保证。但是我国当前的消费体制仍然存在较大的弊端,严重制约了消费能力的释放和消费需求的增长。

第一,国有单位中普遍存在私人消费进入工作性消费的通道,即所谓公款消费,表现为职务型消费、分配型消费、贿赂型消费等多种形式。这类现象带来隐形社会分配不公,造成巨额财税收入流失,对个人消费产生了极大的抑制作用:一是公款消费与私人消费同处一市场,但约束力迥异,公费替代部分私人消费的同时,因其软约束而抬高了市场价格,使得居民相对支付能力降低;二是公款消费具有“浪费最大化”的倾向,侵占了本应属于私人消费的社会资源,例如我国目前轿车主要拥有者是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其轿车拥有量至少占社会保有量的70%,这不仅带来了道路拥挤、污染严重等后果,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私人轿车的消费。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低工资高福利制度阻碍了私人消费的发育,扭曲了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影响了消费结构升级。高福利制度对我国消费市场发育和消费需求带来以下两方面的制约作用:一是单位福利消费的自给性封闭性较强,社会化程度低,致使个人消费对服务业的需求拉力小,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服务价格和质量,进一步抑制了消费。单位福利消费与公款私人消费一起诱发的高消费,导致市场(如旅游业)的冷热并存,过剩与短缺并存。二是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城市公用服务等因社会福利性过强,个人消费比例过低,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产业发展无法进入良性循环。尽

管国家已经出台了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各地必须取消福利分房,但事实上,各地、各部门仍在制定相应的变通办法,这便更加刺激了一些单位加紧进行福利分房,以让一些人分到最后一“杯羹”,加上现行房地产价格形成极不规范,房价过高,与居民的购买力严重脱节,这些都成为住房直接进入个人消费的体制障碍。此外,我国占城镇劳动者人数3/4的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尚未实现收入的工资化和工资的货币化。据估计,这部分职工的全部收入中,通过工资发放的部分约占70%,其余部分则通过补贴、福利、实物等形式发放,政府和企业对职工的交通、教育、医疗、价格等方面的补贴,是对服务单位直接进行补贴,而非对个人直接发放,这些因素易扭曲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影响消费结构合理升级。

2. 消费信贷发展水平低。目前,随着我国以短缺经济和数量扩张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结束,国民经济开始进入优化结构和整体素质提高为特征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已基本从生存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过渡,进入超生活必需品阶段。这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得到印证:(1)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4%下降为1997年的46.4%;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从1978年的67.6%下降为1997年的55.1%,这表明城乡居民满足生存性消费的食品类支出大为下降,消费内容逐渐转向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2)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稳步升级。80年代末期,经过所谓“排浪式消费”,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增长很快。进入90年代以后,耐用消费品一方面以更快的速度继续普及,另一方面开始进行品种、质量、性能等方面的更新换代。由于基本消费品的满足和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相当多的城镇居民进入消费能力升级的准备阶段,居民储蓄余额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到1998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3407亿元,为1990年的9.34倍,平均每年增长5962亿元,90年代是城镇居民储蓄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对于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来说,要依靠他们的即期收入和储蓄来实现从千元级消费向万元级、十万元级消费(住宅、汽车等消费)的过渡,则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国外,消费信贷是帮助中低收入阶层实现耐用消费品消费满足的主要手段。据统计,发达国家银行的消费信贷要占其信贷总量的20%以上,尤其是住宅、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信贷要占到一半以上。尽管去年我国几家大银行已陆续推出了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业务,但消费信贷业务并未得到广泛推行,消费信贷占信贷总额的比重还不到1%。这一方面是由于贷款条件过于苛刻,贷款的成数低、期限短、利率高、范

困窘,以致大多数购房(车)户无力支付首期房(车)款及每月还款利息;对于银行来说,由于消费信贷的客户比较分散,贷款规模小且笔数多,银行风险较大,而保护银行债权的法规不健全,抵押担保登记又存在着乱收费的问题,加大了这项业务的成本,因此对大力开展消费信贷尚有犹豫,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则存在着消费观念的问题,不少人受传统文化和消费习惯的影响,对消费信贷还存在着顾虑。

3. 当前仍然存在着不少限制消费需求的管制政策。政府的一些对消费者消费选择自由和权利的不合理限制给消费需求的增长带来了一定的限制。例如,许多城市用行政手段限制摩托车数量,其理由是缓解交通压力、减少交通事故、保护城市环境等,但是这不仅使我国的摩托车工业陷入困境,大量的关联产业也受到打击,住宅业便深受其害。碍于出行不便,一些大城市郊区住房价格降至市区的1/4仍然滞销。事实上,在我国多种商品和服务市场上,都存在这种“一刀切”的“关门”政策,严重影响了消费者消费选择范围和权利以及消费能力的释放。政府的管制政策不能随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进行调整,压缩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提高。如90年代初对电信业出台了高额电话初装费和电信业务“倒一九”的中央地方分成政策。由于先期私人电话用户多为高收入阶层,因此这一时期的消费政策具有再分配功能,他们为电信业“作贡献”也颇为合理。但是,目前我国电信业的积累已经完成,电话(包括移动电话)在城市也由“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继续维护电信业的垄断高价则会又推动消费变为抑制消费。尽管国家信息产业部已出台一些政策,规定自今年3月1日起,全国各地电话初装费按各地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幅度的下调,但是对于电信业来说,电话初装费这种费用早已不合理,而且作为变动成本的话费及话费的计算标准并未做出调整。事实上,一大部分消费者仍在期待着政府能下调通话费,再次下调甚至取消初装费。电信价格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我国因特网服务提供商(ISP)用于租买线路的成本约占全部经营成本的80%,而美国则为5.6%,高昂的上网费限制了计算机消费软硬件及网络的消费。

4.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减缓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使人们对收入支出的预期恶化,也影响了当前消费需求的增长。近两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3.4%,1998年扣除较大幅度的物价负增长的影响后,实际收入也仅增长5.8%,两年增幅比“八五”时期的平均水平分别下降了4.4和1.2个百分点。农民收入也出现了增幅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的现象,1997年比上年增长4.6%,增幅回落4.4个百分点。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即便考虑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也仅为4.3%,连续两年的收入增幅下降将直接影响到1999年的消费水平。与此同时,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预期恶化。从收入预期来看,人们对未来经济形势和诸多可能影响自己收入的改革前景不了解,加上买方市场下企业经营状况两极分化,大量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恶化,结构调整政策使城镇下岗人员大量增加,城镇居民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员收入预期大为恶化。从支出预期来看,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旧的铁饭碗高福利制度即将被打破,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则尚未建立起来。我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需要改革,但它毕竟使职工有一种生活安全感,因而不必担心失业和失去收入来源,生病没有钱治,退休后没有维持晚年生活的基

本收入等等。而当国家开始实行医疗制度、失业保险制度、住房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等各项制度的改革时,城市居民深切感到过去那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会再有了。在这样一个原有保障制度逐渐打破,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时期,居民便增加了对未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确定性预期,其安全感不可避免地下降,必然把收入中更大部分储蓄起来,用于对不确定的未来的防备和保障,如维持基本生活、防病治病、儿女升学以及购房等。在农村,除了有限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抚恤项目外,社会保障制度更是落后,农民遇到风险基本上是靠家庭提供保障,在收入本来不高的情况下,农民必须储蓄一笔资金,用于抗御各种不可预料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增幅下降,但居民的储蓄余额却依然快速增加,目前已超过5万亿的缘故。居民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做出这样的反应,必然影响社会消费需求的增长。可以预料,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只要居民收入水平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不太可能出现消费需求的大幅增长。

5. 消费环境的制约。1997年以来,启动农村市场就作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有效措施而提出,如果按照收入水平、购买能力和消费升级的规律(如恩格尔系数实现从不断上升到下降的转折)来分析,近几年我国农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应该有较多的增加,多数农村地区将进入家用电器普及阶段。可为什么迄今为止这种消费热潮并没有出现,农村居民的彩电、洗衣机、冰箱的拥有率仍然比较低?除了上面提及的收入增幅下降及支出预期恶化的原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环境的制约,这表现在绝大多数农村的生产生活消费基础设施落后,一些地区用电、供水、道路、电视信号接收站等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而且缺乏必要的商品知识介绍、商品宣传等售前引导,以及送货上门、安装调试、定期回访等售后服务,尤其是大件商品出了故障,维修十分不便,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受到极大的限制;其次,由于农村交通、信息较为闭塞,消费者文化素质较低,农村市场具有多元化、分散性等特点,使假冒伪劣商品有可乘之机,一些不法分子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扰乱市场,骗农、坑农现象时有发生;加上执法工作“重城市、轻农村”,缺少公开有效的监督,农民权益受侵害后,或自认倒霉,或想投诉但往往无门。市场欺诈行为广泛存在,使消费和识别能力本来就较弱的农民对一些产品尤其是大件的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更为慎重。其实,即使是在消费者文化素质和商品识别能力较高的城市,假冒伪劣、市场欺诈也是非常严重,较典型的是住宅市场信用低下问题。购买商品房的诸多“陷阱”使消费者防不胜防,房屋的实际面积与图纸设计面积差距大、房屋质量差和房产证的争议使他们怨声载道。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消费者在购买大额商品时便会“多个心眼”,影响了他们把潜在的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

6. 低水平买方市场下的供需结构性矛盾。经过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消费资料供给总量已经告别短缺,社会需求结构和消费阶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国目前形成的买方市场是与经济发展低水平相对应的低水平的、不完整的买方市场,它表现为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并存,买方市场下形成的供给结构与买方市场下不断变化的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尽管这两年来全国各地普遍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但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形成的产品结构转换仍然成效不大。一方面,档次低、附加值低的产品卖不出去,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库存积压严重,据估计目前积压商

品挤占的资金已达三四千亿元；另一方面，相对较高层次的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不得不依赖进口。我国当前供需结构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的不适应，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不合理，结构升级滞后是制约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对我国现行扩大内需政策效果的评价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大多数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工具。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我国自去年上半年就相应地对宏观经济政策作了调整，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实行的以抑制总需求为目的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变为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这一政策转变对抑制社会总需求的过度萎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扩大投资需求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在出口市场萎缩的情况下，1998年我国相继实行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下调存贷款利率（3月和7月）、发行1000亿元国债（8月）等扩大内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从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扩大投资需求的政策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但是对于消费需求扩张的效果却依然差强人意。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幅明显加快，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457亿元，比上年增长14.1%，增幅比上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11904亿元，比上年增长20%；工业生产速度在下半年以来也逐渐增加，全年全部工业增加至33541亿元，比上年增长8.9%，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亿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至20046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1365亿元，增长4.9%，集体企业4990亿元，增长8.7%，股份制企业1338亿元，增长11.9%。但是，在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强的同时，构成内需的另一面即消费需求却没有出现预期的增长。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两年内连续6次调低存款利率的背景下，居民消费的增长缓慢，而居民储蓄却仍增不减，199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153亿元，比上年增长6.8%，增幅下降4.3个百分点，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而同期居民的储蓄倾向进一步提高，1998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3407亿元，新增7127.7亿元，增长17.1%，储蓄增长率为消费品零售增长的2.5倍，为近7年来的最高点。为何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未能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需要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来分析。在宏观经济学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暗含着一个非常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经济运行于其中的制度和结构是既定的，即在各种经济流程都较为畅通的情况下用扩张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使由于周期性原因引起的总供需失衡得到调节。但是我国目前的国内需求不足，是在体制变迁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发生的，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多方面原因（体制的、政策的、周期的、结构的）造成的，因此，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是政府投资）能够对投资需求的扩张起较大的作用，但是却不能有效地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

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来看，它要对消费需求最终起促进作用，至少面临着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在现阶段，不能用国外刺激消费常用的减税的办法来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只

能借助于发行国债来扩大政府的投资支出；（2）在主要依靠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支出的财政政策框架下，要实现消费需求的增长，必须经过增加就业——增加居民的即期或预期收入——消费需求增长等流程或是通过产业关联带动相关产业，提高相关产业就业者的收入进而增加消费需求，但是当前我国公共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如修路、架桥、修建水利设施和码头等都属于资金密集型的项目，能够吸收的就业有限，这些项目所吸收的劳动力与当前最急需解决就业的下岗职工存在差异，而其所投资的项目大都是产业关联都较小的领域，因此它对提高收入从而促进消费的效果必然有限；（3）人们常认为货币政策效果存在认识时滞、决策时滞、效应时滞等政策时滞，而财政政策外部时滞较短，对收入的影响快于货币政策，事实上我国财政政策存在着一个较长的内部时滞，尤其是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一般都比较庞大，从工程立项到开工，再到发挥效益，周期很长，见效也慢。从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所赖以实施的国债规模来看，目前我国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9.6%，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1997年为1.5%，预计1998年为2.1%，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和3%的警戒线，但是我国财政收入仅占GDP的11%左右，而所谓的警戒线也主要是适用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20%到50%的发达国家（如欧盟），而且我国中央政府债务依存度（目前为76.3%）和国债偿还率（24.3%）指标都已远远高于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分别为25%~30%和10%）。因此，继续沿用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国内需求的办法已不太可行。

从当前的货币政策实施情况来看，为了配合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通过强制性扩大贷款货币供应量，并连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这对扩大投资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大大缓解了经济的下滑速度。但是，市场经济国家在提高消费需求方面较为管用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正如前面所述，尽管我国两年内连续6次降低利率，但是居民储蓄不降反升，消费需求增长极为缓慢，对于这种情况，众多学者就我国目前是否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展开争论。我们认为，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与我国目前消费信贷不发达进而货币传导机制较弱有关。众所周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消费信贷来实现的，利率的变化通过对消费信贷的影响来影响消费需求。但是，在我国，由于消费信贷业务迟迟不能推广，货币政策的调整对居民消费引导的效果便大打折扣。此外，由于多项改革措施齐头并进，加上对未来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影响不明朗，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稳定甚至恶化，都会促使其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大大抵消了利率下调的效果，使得居民的储蓄倾向居高不下。

由于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那种调控了投资需求便调控了消费需求的“短缺经济”已经让位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环境。因此，以扩大投资需求为主要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只能作为一种短期政策。从长期的经济增长来看，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应主要靠消费需求的扩张来引导投资需求的增长，以实现经济的良性的稳定增长。如果再沿用过去那种以投资带动消费的方法，那就又会将我国经济引向粗放型增长的老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将越演越烈。在我国目前的体制背景下，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对消费需求增长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必须换一种思路，那就是主要依靠消费体制的变革和消费政策的调整来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

三、当前刺激我国消费需求的主要对策

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对刺激消费需求作用有限的情况下,应该针对造成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有的放矢地推进体制改革和进行政策调整,要把提高消费需求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为此,政府、银行和企业都应有所作为。

1. 进行消费体制改革。我们在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消费体制的改革。应该看到,现行消费体制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居民消费能力释放的主要因素之一。首先,针对现行消费体制下存在着“公私消费不分”的弊端,基本的改革思路是封闭公私混合消费的通道,对私人生活消费和公事消费交叉的领域,可以采取将“公有私用”转变为“私有公用”,由单位对个人提供一定的消费补偿。以轿车为例,只要取消公务用车制度,把一般工作交通纳入私人消费范畴,以机关事业单位减少150万辆车,每车每年耗资2万元的保守数字估算,财政一年少开支300亿元。取消公车对私人购车会带来强烈刺激作用并改善市场环境。其次,通过工资改革,改变目前的高福利、低工资制度,并逐步实行职工收入工资化和工资的货币化,改革福利型消费方式,将国家和企业对职工住房、医疗、交通、教育等方面的补贴,“明补”转为“暗补”,把本应属于私人消费的项目从社会消费和集团消费中分离出来,使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权和决策权。这不仅减轻财政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使消费者错误的消费观念和不合理的消费行为得到矫正,促进消费市场的发育。

2. 切实将发展消费信用作为当前启动消费需求的重要举措。通过推广消费信用刺激私人消费,已经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今年初以来,全国各地的银行业都开始准备启动消费信贷。但是,目前的消费信用仍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信贷范围较窄、规模较小之外,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个人信用评估困难,办理信用消费手续繁多,消费者消费观念落后等。要实现以信用卡透支的方式普及消费信贷,并使之成为居民消费真正的助推器,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解决持卡人的信用问题,可以通过成立个人信用征信机构和相应的个人信用信息风险网络,建立信用消费征信制度,这需要发放工资单位、企业与银行密切配合;二是必须形成普遍的支付手续简便快捷的信用卡支付系统,这需要商家和银行密切配合;三是建立健全各种金融风险保障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分散银行的信用风险,保障银行的权益;四是商业银行要积极探索新的消费信贷品种,如除了住房、汽车信贷外,将其扩展至多种耐用消费品;五是要采取措施消除消费信贷中的各种障碍何不合理因素,降低住房、汽车等抵押登记中的不合理收费,同时搞好信贷、保险、经销等环节的衔接和配套。

3. 放松消费管制,适时调整限制消费需求的管理措施和办法,并在一些公共服务或自然垄断行业中适当引入竞争。一是调整许多大城市目前所采用的对汽车、摩托车限制消费的措施,采用更符合经济原理的办法经济管制,如通过定额拍卖行驶牌照达到适度控制轿车总量缓解交通问题,通过指定销售低功率、高品质车中来减轻污染问题等;二是进一步调整电信业价格,在电信业中适当引入竞争,继续调低电话初装费,稳定居民的预期,尽快改变移动通信“双向收费”的不合理做法,以促进我国的电信服务消费和一些与此相关的高科技产品(如个人电脑)或服务(因特网)的消费;三是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

过高的电价进行调整,逐步做到城乡用电同价。

4. 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尽快消除消费者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产生的不安定感,改变人们的消费支出预期。当前不少居民对房改、医疗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等的具体内容并不太了解,担心会因此大幅度增加各项支出。应该说,他们的这种担心有符合实际的考虑如教育支出,即改革后有些支出将会有较大幅度增加,但也有因紧张心理而过大估计支出的因素在内,如对医疗体制改革即是如此,这样便过多地压缩了即期消费需求。因此,应该加大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内容的宣传力度,尤其是要对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优越性进行广泛宣传,同时,对目前因需建立个人账户而略有增加的个人支出要尽快制度化,消除消费者因对新体制不了解不适应所产生的不安定感,使其在适应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建立合理的预期,适度降低储蓄倾向,增加即期消费支出,从而促进社会消费需求的生长。

5. 为消费者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一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电网、道路和通讯等的建设,采用国家增加投资和组织农民集资、参股等多种方式,多方面筹集资金,让更多的农村通电、通水、通车,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电网改造的力度,切实降低农村电价,将农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欲望转变为现实的购买力,这将为我国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二是净化市场环境,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工商管理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坚决与所办市场脱钩,促进职能转变、公正执法、监管到位,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市场管理法规,净化市场环境,打击制假、售假、贩私、商业欺诈行为,尤其是要打击城市房地产市场和农村消费品市场中的假冒伪劣和商业欺诈行为,为消费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

6. 加强供给管理,以创造供给来启动消费。在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除了要扩大需求外,还要加强对供给结构的管理,即在适当限制供给过快扩张的同时,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并通过创造一部分供给来启动新的消费需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有意识地限制生产,限制新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有计划地压缩或淘汰过剩的生产能力;(2)调整供给结构,实行资产重组,推动资本向优势产品、名牌产品集中,提高供给的质量;(3)用创造供给来创造新的需求,针对市场过剩中的短缺来创造供给,培养新的消费热点,如高技术产品,通过新产品的不断供给来吸引新的消费者,并启动原有消费者新的消费需求。

注释:

苏刚:《消费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载《经济学消息报》,1998-08-07。

丁俊发:《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新趋势》,载《经济学动态》,1999(2)。

苏刚:《“消费限制”一瞥》,载《经济学消息报》,1998-08-21。

周天勇:《总需求萎缩的深层梗阻及其扩张途径》,载《经济研究》,1999(1)。

杨目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效果分析》,载《经济学消息报》,1998-12-04;《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载《改革》,1999(1)。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 广州 510631)

(责任编辑:曾国安)